



The Politics of Mem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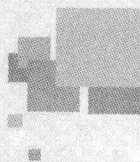
记忆的政治

有关大生产运动的社会记忆，
的、革命话语的体系化建构。
忆也在不同历史时期被反复重构，
党提供了丰厚的政治合法性资源。

周海燕◎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记忆的政治

周海燕◎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记忆的政治/周海燕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80234-979-7

I. ①记… II. ①周… III. ①社会语言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3714 号

书

名: 记忆的政治

著作责任者: 周海燕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234-979-7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联系电话: (010) 68990630 68990692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络订购: <http://zgfcbs.tmall.com/>

网购电话: (010) 88333349 68990639

本社网址: <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件: bianjibu16@vip.sohu.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推荐语（代序）

就当代中国政治及社会史研究而言，周海燕关于大生产运动的著作，有着杰出的贡献。关于党治如何掌控民众对复杂历史事件的记忆，周著阐明了它的基本模式与诸种内涵，其意义远超个案研究。

这一运动的过程，是关于威权统治与政权合法性的宝贵课程——对毛时代的中国如此，对后毛时代的中国亦复如是。

——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政治学教授Elizabeth J. Perry（裴宜理）

大生产运动是中国共运史的一个转折点：在战争中形成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模式，后来成为战后中国社会的核心特征。然而，我们对这场运动知之甚少，甚至于那些我们笃信不疑的事实，也不过是在宣传“南泥湾精神”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诸种神话的一部分。

周海燕的著作改变了这一状况，她用关于政体合法性和记忆政治的分析框架，向我们叙述了一个真实的大生产运动，以及党是如何将“南泥湾精神”作为政治工具和政治建构，以动员民众达成诸种目的的过程。

从三五九旅，到英雄的模板化、政治口号的创造，再到历次唤起“南泥湾精神”的热潮，直到当下作为商业工具的“红色旅游”，周著还延展了南泥湾的完整叙事。

通过展现一场著名政经运动的建构与再建构，《记忆的政治》透视了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该书堪称学术著作之典范：言其肯綮，察其关键，思之明悟，读之愉悦。

——弗莱堡大学汉学系主任、历史学教授Nicola Spakowski（史明）

以社会记忆和话语分析理论为基本框架，围绕1940年代初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及其后形成的各类叙事文本作话语分析，周海燕厘清了有关“大生产运动”的社会记忆不断被建构的过程，揭示了权力和话语在其间相互纠缠的关系，并对大生产运动及其相关记忆进行了相当深刻的解读。

凭借丰富的田野资料和历史文献，作者确证了一个堪称精湛的解释框架。在这一框架之下，“大生产运动”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为解救因经济困难而面临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所做的战时应急性政治动员，同时也是运用“劳动”手段对人群进行社会改造和社会控制的基本过程。在此基础上，作者揭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组织起来”、“鱼水情深”和“官兵一致、人人平等”等核心语义代码，是如何建构大生产记忆的核心——“南泥湾精神”的。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周晓虹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1. 南泥湾叙事：记忆建构与认同塑造	2
2. 话语、社会记忆与权力：社会史研究的一种路径	12
3. 大生产运动：既有结论与“再发现”的可能	23
第二章 红色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35
1. 厚土之上的凋敝古城	36
(1) 征战之地	36
(2) 地理、经济与社会发展	38
2. 陕甘宁边区的政策制定与民众认同	42
(1) 认同聚合的基础	43
(2) 政治动员、民众参与与基层组织建设	47
(3) 意识形态的输入	51
3. 繁荣下的危机	55
(1) 公粮危机	56
(2) 合法性基础的动摇	61
第三章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危机下的紧急政治动员	73
1. “大生产运动”的提出与神圣意义的赋予	74
(1) 边区危机的真实起因	75

(2) 政治议题的神圣性赋予与认同建构	82
2. 议题的政治动员	87
(1) 劳动竞赛：规训与激励	88
(2) 典型生产：红色偶像的诞生	93
3. 红色符号体系的形成	100
(1) 红色民歌的符号生产	101
(2) 秧歌剧中的符号生产	114
(3) 延安木刻中的符号生产	119

第四章 南泥湾精神：核心记忆代码的形成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记忆	135
(1) 两场战争和一条出路	136
(2) “自己动手”：从“出路”到“道路”	138
2. “组织起来”的记忆	142
(1) 改造二流子：游民规训与惩戒	143
(2) 变工与扎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先声	152
(3) “生产—整风”双重规训：知识分子的道路	158
3. “鱼水情深”的记忆	166
(1) “拜师”	166
(2) “纳谏”	168
4. “官兵一致，人人平等”的记忆	172
(1) 领袖干部的生产传奇	172
(2) 家国同构的红色叙事	176

第五章 模范是如何塑造的

1. “南泥湾政策”：鱼水情深的屯垦传奇	188
(1) 从“烂泥湾”到“南泥湾”	189
(2) 三五九旅的集体人格塑造	192
(3) 生产与战斗，不朽的神话	200
2. 吴满有方向：首个“典型人物”的诞生与遗忘	204
(1) 谁能成为“吴满有”	205
(2) 翻身、感恩与革命	208
(3) 被符号化的吴满有	213

(4) 记忆的系统性剥夺及其民间抗争	218
3. 赵占魁运动：工会整风中竖起的红旗	222
(1) 清查“坏分子”	223
(2) 发现“好人”赵占魁	230
(3) 新式劳动者的政治人格塑造	234
(4) 整风中的思想改造与社会记忆重构	238
第六章 话语即权力：大生产记忆的三次重构	251
1. “人定胜天”：1960~1966年的《人民日报》大生产 记忆话语分析	255
(1) 话语对象和话语主体	259
(2) 话语主题及其阐述模式	266
(3) 话语的社会影响	272
2. “到农村去”：1970~1978年的《人民日报》大生产 记忆话语分析	278
(1) 话语对象和话语主体	281
(2) 话语主题及其阐述模式	285
(3) 话语的社会影响	294
3. “艰苦奋斗”：1989年6月~1996年的《人民日报》 大生产记忆话语分析	295
(1) 话语对象和话语主体	297
(2) 话语主题及其阐述模式	301
(3) 话语的社会影响	305
第七章 作为地理实在的南泥湾：红色记忆与中国现实	315
1. 空间叙事中的红色记忆建构	318
(1) 精心复原的“革命遗产”	320
(2) 被安排的叙事史	324
(3) 行动者的四种模式	329
(4) 生产劳动体验教学：一次完整的记忆建构	335
2. 村落记忆与中国现实	339
(1) 饥饿、生产与斗争	340
(2) 三次“新农村建设”的记忆	347

(3) 分裂的村庄	352
(4) 红色记忆经济学	359
结论 大生产记忆与中国道路	369
1. 作为战时紧急政治动员的大生产运动	371
2. 作为政治合法性资源的大生产运动	373
3. 作为规训手段的大生产运动	375
参考文献	382
后记	393

第一章 | 导论

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大卫·奥威尔

1 南泥湾叙事：记忆建构与认同塑造

1941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这是中国8年抗战中敌我双方争夺最为激烈的一年——从豫南会战开始，中日双方先后进行了5次大规模会战，在8年的22次大会战中占了近1/4。与此同时，国共两党由于在兵力投入、财政支出等各方面意见不一，合作关系渐趋恶化。

关系恶化的首要原因当然是因战争中的兵力投入差距和相互配合不佳所导致的争执，以及争夺抗日战争中的话语权、对地区的控制权等等，但陕甘宁边区以及其他由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因供给严重不足而产生的经济危机，也是双方争执的重要内容。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原为中国共产党所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所辖区域，国共合作之后，1939年9月，这个地区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所辖者包括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延安、安塞、甘泉、保安、延长、延水等共26个县市。

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地带，干旱少雨，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农牧业交错经营的生产方式。由于明清两代大力垦荒，开发过度，“虽悬崖偏僻，天地不废”^[1]，形成了过度垦荒以获取粮食的耕作模式。这种耕作模式在以后的数百年里导致当地水土流失严重，森林和草原迅速消失。

自清末以降，战乱频仍，陕西人口骤减，尤其是农业人口总数下降至为剧烈。在延安市，至红军进驻前，人口仅约在3000人左右。

“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各界压力之下明确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西安事变得和平解决。次年的1月13日，红军迅即进驻延安，将其作为中共中央机关的所在地。此后，延安人口迅速增加。除去进驻的部队士兵、机关干部和学生外，仅市内居民人口就上升

到14000人^[2]。到1939年9月，下辖26个县市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时，其辖区人口已经达到近150万，此时，整个陕甘宁边区的耕地总面积为862.6万亩，即人均耕地约5.7亩。

土地虽多，却极为贫瘠，且乏人耕种，边区粮食产量并不丰裕。1937年，整个陕甘宁边区的粮食总产量为110万石，1938年的粮食产量则为130万石^[3]。以1938年秋打下的粮食总量除以1939年的人口数量，边区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0.87石，即140斤左右。

农业之外，整个陕甘宁边区的商业和工业也处于极度落后的地位。此地偏居西北，工商贸易以盐业出口为主，以此来换回必需的其他日用品，经济基础极其薄弱。

抗战早期，为了最大程度地争取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很快提出了“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的财政政策。1937年1月25日，也就是进驻延安后仅12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即就红军的经费开支问题致电潘汉年，要求向蒋介石转达每年拨款120万元作为红军的伙食、薪饷等项开支的要求^[4]。经双方反复磋商，最终以4.5万人的编制发饷。但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发展迅速，军饷入不敷出。中共中央曾经在1938年、1939年多次就八路军的军费问题与国民政府交涉，要求为人员已达50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战士提供军费、枪支弹药和其他军需补给物资^[5]。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区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绝大部分来源于国民政府调拨以及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这期间，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经济命脉，可说完全有赖于外援的多寡。

从1939年开始，国共关系渐趋紧张。国民党频频指责八路军“游而不击，领饷不战”，并于1940年冬对陕甘宁边区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政府完全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弹药和被服等军用物资，声称要“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声言将断绝对于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对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共产党控制的边区实行全面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这使得边区经济发生了极大的困难。

时局变化以外，非生产人口的迅速增加，也是造成边区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红军主力部队进驻和中共中央机关的到来，延安等地人口骤然增加，据统计，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时人数约为5000~6000人左右^[6]。至1939年，八路军留守部队人数为9000人左右^[7]。

1940年，据杨尚昆回忆：“1940年底，我到延安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情况十分困难……陕甘宁边区140多万人口，要供给7万脱离生产的干部和战士。”^[8]也就是说，此时非生产人口已经达到了7万人。

到1942年，延安的党政干部总数达到1.2万人，军队人数在10万左右。而仅仅一年以后，党政干部的人数就增至3万人，而延安市民则只有1万人。较之1937年，延安人口增长了近17倍^[9]。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非生产人口的增加，而原因则是毛泽东急于扩大实力与蒋介石抗衡。在这一点上，强调“精兵简政”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与之意见相左，曾发生极大分歧。

由于军队、干部、学生等非生产人员迅速增加，边区的购粮款大幅度增长，一度占年财政收入的18.86%。1940年以后，外援断绝，边区政府财政紧缺，无款购粮，开始完全依靠向当地农民征粮来解决机关干部、部队人员和学生的粮食供应问题，这使农民的公粮负担迅速由1939年的5万石增至1940年的9万石。即使如此，依然入不敷出。为了保证粮食供应，1941年，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决定征收“救国公粮”20万石，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14%，比1940年翻了一倍多，是1939年实际征收量的4倍、1937年实际征收量的14倍^[10]。出产寡，而食者众，必然导致粮食、布匹等基本生活物资的紧缺和物价上涨。短短4年里，边区物价涨幅超过15倍，物价指数从1938年的143.1上涨到1941年的2228.9^[11]。负担的加大和物价的飞涨，使得边区百姓普遍产生了不满情绪。

对于这一阶段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的一部分领导人实际上是有所觉察和准备的。早在1939年（即民国二十八年）2月2日，针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毛泽东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即明确指出：“我们面临有三条路：饿死；解散；自己动手。饿死，没有一个人赞成；解散，也没有一个人赞成；自己动手，才是出路。”^[12]为解燃眉之急，毛泽东明确要求部队、机关、学校制定生产计划，增加自给能力。但是，这个阶段，整个陕甘宁边区包括中共中央领导在内，并未充分认识到生产自给的重要性和迫切程度。不久，自给生产实际上就已趋于停顿。

外援既已断绝，内需又日渐增长，到1940年底，边区已经到了极为艰困的时刻。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描述

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13]

在朱德的考察和推动下，1941年春，王震率领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这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有关的历史叙事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国历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传奇故事之一。

经过3年大会战式的垦荒运动，三五九旅在缺乏生产资金和生产工具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使南泥湾发生了巨大变化，时称“陕北好江南”。到1943年，三五九旅已经垦荒10万余亩，生产粮食1.5万余石，不仅种上了陕北少见的水稻，饲养了成群的猪、羊等牲畜，还成立了大光棉纺厂，从向百姓借的一架旧织布机和向商人赊的一捆纱开始，发展到拥有800多名工人、108台机器，能够生产200多种产品的大型纺织厂，解决了部队的被服供应问题，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模范。

在三五九旅的带动下，陕甘宁边区和部队以及其他地区相继开展“大生产运动”，秉承中共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各边区部队、政府工作人员、学生都开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自救行动，农民们也在政策的鼓励下积极开荒放牧，边区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好转。

以“南泥湾精神”为核心的“大生产运动”，以其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独特地位，成为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一章：它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到当时为止所进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实践活动。在这次生产运动中，除部队、机关工作人员和延安各学校的青年学生所垦荒地之外，仅陕甘宁边区的农民们就垦荒达330.1万亩。到1945年，边区耕地总面积已经达到了1425.6万亩，较1937年增加了563万亩，此时，边区人口总数为160万人，人均耕地达到了8.9亩^[14]。

伴随一系列代表巨大经济建设成就的数字的，是一系列为人们所熟知的、近乎传奇的革命故事：毛泽东挥笔写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三五九旅高唱“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进军南泥湾；王震聘请71岁农民为“生产教官”、“烂泥湾”三年变成“陕北好江南”；毛泽东亲切看望7岁纺纱能手小吴萍；流浪工人赵占魁成为“工人运动的旗帜”；二流子申长林被改造为劳动模范……随着这些故事的反复铺陈言说，当时的一些政治口号如“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组织起来”以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等，也被广泛传播开来。

纵观这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不可忽视的，是中共中央所采用的一系列宣传手法和动员手段：利用发布政府文件、工作报告、新闻报道、大会动员、劳模表彰、标语宣传、街头诗歌、秧歌剧、活报剧、大合唱、戏剧表演、木刻创作、小说、剧本乃至拍摄电影纪录片等多种方式，一向擅长宣传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成功地动员了干部、战士、学生、工人以及边区农民乃至无业游民，使其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并且还在此后的一次又一次生产建设中让这段记忆不断在人们的脑海里被唤起和固化，使“大生产运动”在此后的数十年内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词。在1957年至1959年的“大跃进”运动，以及“农业学大寨”等一系列急风暴雨式的生产建设运动中，通过对大生产运动中若干历史事实有意识的不断选择、重构，“南泥湾精神”以及它所依托存在的一系列传奇故事，与此前的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万里长征，以及此后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等一起，成为国人关于中共创业史的社会记忆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5]。

需要格外注意的是，时值大生产运动中后期的1942年2月1日，延安整风运动正式开始^[16]。5月23日，以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发表总结性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17]，延安文艺界开始了一场批判和清理“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延安文艺运动”，随之以鲁艺、抗大师生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转向使用“民族形式”表现现实主义题材，进行文艺创作。同时期进行的大生产运动，就非常自然地成为他们结合现实进行创作最重要的内容。1943年，贺敬之和马可为秧歌舞《挑花篮》创作了歌曲《南泥湾》，歌颂三五九旅开荒生产，把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类似的作品如1943年鲁艺教师王大化、学生李波创作演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被评选为劳动模范的美术家王式廓同年创作的木刻作品《改造二流子》，由袁牧之、吴印咸等带领的延安电影团1942年拍摄、1943年播映的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等，都是当时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使用“民族形式”表现现实主义题材的尝试。《改造二流子》、《烧炭组画》等后来还曾经被周恩来带到国统区进行展览，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生产和生活。作为艺术作品，它们在当时很大程度上承担

了传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之意识形态与政治主张的任务。

罗兰·巴特曾为“一个社会构造出来以维持和证实自身的存在的各种意象和信仰的复杂系统”赋予“神话”的定义^[18]，大生产运动的种种“神话”，正是通过柯文所说的“即时神话化”的过程^[19]，由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边区艺术作品和政府工作报告、党的文件、报纸新闻、口号、标语、民谣等宣传大生产运动的有效载体而广泛传播，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文件会被湮没，报告会被遗忘，新闻终将成为旧闻，但正是这些文艺作品使得一系列被我们称为“南泥湾精神”的、关于大生产运动的社会记忆被牢固地保留至今。

国内外一批学者如金观涛、刘青峰、施拉姆、马克·塞尔登等学者均指出，正是从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成功地确立了自己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权威，并且以此为基础，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夺取国家政权的“中国式道路”^[20]。但是，要保证一个政权的稳固和发展，经济上有所建树是基本前提——经济崩溃的政权不可能维持其长期和稳定的统治。因此，“中国式道路”不可能只仅仅包括政治和军事上的一系列政策，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是经济建设方面的制度设计和运作。因此，必须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是何时形成自己关于经济建设的系统性制度的？

中国共产党早期关于经济方面的思考呈现出照搬外国理论，缺乏实践经验、难以与现实情况结合的特点。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王明等人，均曾就经济问题进行过系统的思考和阐述^[21]。1933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查田运动”等一系列斗争中开始了自身对于经济建设的初步尝试，既有经验尤其是财政收入方面的经验以“打土豪 分田地 挖浮财”为主，还出现了照搬苏联经验的现象^[22]。由于这些政策过于激进，在后期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成为第五次“反围剿”中导致军队失败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大革命失败后，在长征时期，红军面临万里跋涉、生死辗转之际，无暇也没有能力关注生产建设的问题；在延安时代的早期，中共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落地生根”，在陕北根据地尽早获得当地民众的广泛认同。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对于富农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其他经营的土地、商业和财产不予征收”，并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和发展工商业的自由等^[23]。西安事变之后，共产党开始了与国民

党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这期间的1937年至1940年，中共中央考虑到巩固根据地的必要性，执行“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的财政政策，如前所述，主要依靠外援和国民政府所发给八路军的每月60万元军饷支撑财政运行。

由此可见，在1941年开展大生产运动之前^[24]，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有了一定关于经济建设经验的积累，但多为对苏联式经验的生硬模仿，甚少考虑这些“先进经验”与中国乡村现实的契合可能，对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实际上缺乏实际的操作经验。

毛泽东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产生，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高干会，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25]

对正处于艰难创业期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性在于，以准军事化的模式，通过战时的高度政治动员，发动包括军队、农民、干部、工人、学生和商人在内的各个社会群体进行经济建设，迅速和有效地改变了当时边区完全依赖外援、军队衣食无着、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的局面，在4年里大大改善了边区的经济状况，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式道路”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民众认同基础，这使得大生产运动在中共建党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边区经济崩溃，必然导致整个边区的崩溃，中国共产党就很难坚持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刻；失去边区民众的信任，就不可能在之后获得全国民众的信任；1944年前往陕甘宁边区访问的美军观察组（即“迪克西使团”）以及由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组成的个人考察团，就不可能看到延安蓬勃向上的一面并且传播给国内外的民众，就很难获得边区之外国内外民众的同情和关注。

在大生产运动之后，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对于自己如何进行经济建设有了信心：“事实证明共产党不仅能破坏旧的，而且是有能力来建设新的。”^[26]

大生产运动在中共中央对未来红色中国的蓝图中勾画了关于经济建设模式的重要一笔。其中所采取的一些激发劳动积极性的政策措施，如通过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大会战”方式组织生产、实行男女集体分宿、组织劳动合作社、制定生产定额、树立劳动模范、改造二流子等，均在其后的多个不同历史时期被广泛应用。

这一系列强调国家政治动员、强调高度军事化体制的生产建设的做